

汉语学界圣经(新约) 研究三十年(1976-2006)

——现状及评估

查常平

内容提要:面对今天汉语学界的基督教研究,我们更需要强调神学的而不只是其他世俗科学的角度。在本人的新约研究中,我主要使用历史逻辑的研究方法,即从新约文本内含的语言观、时间观、正义观、信仰观四个方面展开诠释。这里,我们可以从此观察汉语学界三十年来的新约研究,其特征为:从圣经的语言、时间观念、社会正义方面切入者较少,大多选择基督论的、跨文化的比较视角;基督论的视角,主要是从历史学、神哲学而不是神学传统中的角度,仅关涉历史上的耶稣问题。跨文化的比较视域,限于希伯来、希腊、基督教、汉语思想的典籍与传统,关系到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人观、伦理观几个大的方面;从它所涉及的对象看,对观福音、路加神学、普通书信、《启示录》基本上无人问津。它在宏观上由于学者们没有建立独特的系统神学,因而在具体研究时很难有深度的文本与神学阐释;在微观层面,由于普遍对圣经经文的细读体会不够,因而很少见到独特的文本与神学阐释。至于与实践处境结合方面,就更显得停留于表层。因此,汉语学界的圣经新约研究,应当从语

言文本经典、神学理解传统、当代处境实践三个方面推进。不过，美国西北大学的华人学者杨克勤博士从诠释学传统发展出新约跨文化修辞诠释学，值得学界注意。

关键词：语言观；基督论；跨文化

Studying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World:A Survey (1976–2006)

Zha Changping

Abstract: As far as the 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ese Academic World are concerned, the theological (not only the other secular scientific) perspective should be more emphasised today. In my studies of the New Testament, I principally use the methodology of the history–logic which will abstract the logical principles through interpreting the conception of language, the conception of time, the conception of justice and the conception of faith in the historical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With the view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historical logic, we will fi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Chinese Academic World from 1976 to 2006 are these as follows: as an approach to faith system, the comparative Christologic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s chosen by the most Chinese scholars, while the other approaches of the biblical language, the conception of time and social justice are used less. Even in the field of Christology, the most papers researched i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philosophical not traditionally

theological stand, only having referred to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Jesus. The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ies, which discuss several parts including the conception of God, Christology, pneumatology, the idea of human being and ethics, refer to the books and traditions among Hebrew, Greek, Christian and Chinese thoughts. In point of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 Synoptic gospels, Lucan theology, the Catholic Epistles and Revel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are seldom researched. Without having established any specific systematic theology,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Chinese scholars to delve into the textual and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macro level in their detailed research. Because in general the biblical scriptures did not be made a study of verse by verse on the micro level, the special textual and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could not be found less. The deep combination of Christian faith with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did not come into being. Therefore the Studies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Chinese Academic World should be progressed forward in the future from the three ways of the scripture of linguistic text, the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However, it is worthy to note the cross-cultural rhetorical hermeneutics developed from the Western hermeneutic tradition through Yeo Khiok khng who is a professor i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USA).

Key words: conception of language; Christology; cross-culture

本文最初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中国大陆,后来发现尤其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基督教文化评论》(1990)、《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4)、《基督教文化学刊》(1999)等丛刊问世,包括大陆、港台、欧美华人地区以汉语为表达媒介的华人学者,都积极参与了以汉语神学^①为目标的圣经研究。本文以大陆学者为主、兼及境外部分学人,论题主要限于新约研究。

一、研究概述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贾玉铭便出版了《希伯来书讲义》。^②但其影响,局限于当时的神学院。1953 年,《金陵神学志》开始出版,其中发表了一些教内学者关于圣经的文章。其思考的出发点,是基于中国教会当时的现实处境。如在“圣经是否否定人的价值?”^③一文中,作者认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而上帝的形象为仁爱、公义、圣洁、良善,那么,上帝愿意人能有这些品质,以此批评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盛行的种族优越论;人心的善与义从上帝而来,即便在亚当堕落后,人也保持着上帝的形象,以此批判当时一些教会中被认为是“片面宣传”的人类全然败坏的教义,从而为现实中千千万万人的善良业绩辩护;上帝的心意不是仇恨,要除灭人类,而是爱;人生的价值、意义在于人能与上帝同工,人要为自己死而复活的活着,看重人的地位与价值。凡此种论点,作者都列出了圣经经文的根据。但是,作者显然忽视了更大的现实,即那些被其批判的人也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而且

① “汉语神学”的外延含义说明,见《道风汉语神学学刊》复刊辞,1994。

② 山东华北神学院,1926;橄榄基金会,1994。

③ 徐如雷:“圣经是否否定人的价值?”《金陵神学文选 1952—1992》,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2,第 183—192 页。原载《金陵神学志》1954 年第 2 期。

忘记了上帝的公义对于现实的审判这个维度。不过,总体上,中国教会在圣经观方面的思考较少,“甚至还是空白”。^①

在研经工具书方面,《圣经语汇词典》^②按照圣经及有关资料注释其中常见或常用的词语的意义,列举有关章节,有时提供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原意。每个词条分为“注释”和“圣经记载”两部分,在神学成果介绍方面过于简短,只能作为一般读者或翻译者的普通工具书。但该书的优点在于直接让圣经经文本身来说明词条的意思。此外,在一些丛书里出现了围绕圣经研究的专题翻译著作,如《实用释经法》、《启示录问答》。^③

汉语学界的圣经研究,属于基督教研究的一部分。基督教研究的热点,“包括基督教历史发展,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国基督教史及其教会教育、教案研究,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现状等问题。”^④从这些总结性的话语中,我们发现基督教经典研究显然不属于汉语学术的热点。到1996年,除了朱维之从文学角度撰述的《圣经文学十二讲》^⑤和《基督教与文学》^⑥外,其他的《圣经蠡测》(文庸,1992)、《圣经鉴赏》(卓新平,1992)、《新约导读》(蔡咏春,1992)之类的著作,都属于知识性的书籍。《圣经文学十二讲》系统介绍了包括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及其圣经文学对东、西方的影响,圣经、次经、伪经、死海古卷的来历、内容等;《基督教与文学》阐述了耶稣、圣经、圣歌、祈祷、说教等与基督教的关系,具体论述了基督教对

① 参见丁光训“序言”,《金陵神学文选 1952—1992》,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2,第1页。

② 白云晓编著:《圣经语汇词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006年第二次印刷。

③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④ 卓新平:“基督教研究概说”,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 199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82页。

⑤ 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⑥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民国丛书之一),上海:上海书店,1992。

后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作用。至于从整体视角出发探究圣经的,近年有奥地利学者雷立柏著的《圣经的语言和思想》。^①最近,孙毅的《圣经导读》^②从历史背景、文本结构、主题思想三个层面着手,将概括性介绍与重点章节结合起来导读全本圣经,突破了此前圣经介绍类著作限于一般性概述的弊端。不过,比起基督教研究的其他领域,汉语学界“研究圣经的著作毕竟太少了,无论是信徒们从自身信仰角度的理解,还是学者们从客观立场进行的纯学术研究”。^③“严格地讲,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圣经研究,或者说对圣经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对圣经的研究多注重其文学艺术性而较少注重其文献学的和哲学思想的研究,而且很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汉语学界的圣经研究成果全部否定。因为,这里所说的“汉语学界”,仅仅限于中国大陆。不过,和西方相比,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北美等地的整个华人圈的汉语学界的圣经研究成果依然太少。

依据迄今发表的论文看,中国的圣经研究从论题看主要呈现出如下两个特征:1、对局部的研究甚于总体的研究;2、宗教学研究甚于神学的研究。所谓对局部的研究,主要指对圣经的个别经书、个别论题的讨论,或者将这些论题纳入长时段的基督教哲学史、^⑤基督教教义史的范畴。围绕神义论与人义论这一正义主题,不少学者发表了反思《约伯记》的文章,如刘小枫的《〈约伯记〉与古代智慧观的危机》,尤西林的《德行不再许诺幸福——〈约伯

① 雷立柏:《圣经的语言和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5。

③ 文庸:“圣经研究的一个误区”,《世界宗教资料》,1990,第4期,第53页。

④ 文庸:“圣经研究的一个误区”,《世界宗教资料》,1990,第4期,第54页。

⑤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二节“圣经观念的历史演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记)与古代报应观念的衰落》,梁工的《〈约伯记〉刍议》等。^①作为个别论题,还包括从非教会的传统探讨《圣经的成书和版本》、^②《基督教〈圣经〉的翻译出版》、^③《〈圣经〉的宇宙观》、^④宗教改革和《新约圣经》的关系、^⑤圣经语言的修辞学、寓言^⑥等等。同时,港台学界还从汉语思想的语境中,对比性地阐释圣经与《易经》、圣言与中国之“道”、圣经的“上帝”与儒家思想的“天”、圣经与《道德经》所内含的基督论等论题。^⑦不过,也有学者全面考察过圣经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文学的价值。^⑧遗憾的是,这种全方位的圣经研究在汉语学界并不多见。况且,以上的种种研究主要是从宗教哲学的、文化史的而不是神学的视角。

至于汉语学界的《新约》研究,也明显带有上述两个特征。此外,无论是对《死海古卷》的分析^①还是对《Q福音》的溯源以及它

- ① 分别见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369—404页;刘小枫主编:《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第13期,第173—184页;梁工:“‘约伯记’刍议”,《世界宗教文化》,1997,第11期,第28—31页。
- ② 庸夫:“圣经的成书和版本”,《世界宗教资料》,1982,第1期,第37—40页。
- ③ 吉少甫:“基督教圣经的翻译出版”,《出版史料》,1987,第4期。又见巴里·霍布曼:“关于英文本圣经的翻译”,《世界宗教资料》,1991,第4期,第12—18页。探讨中文圣经的翻译文章有谭树林:“圣经‘二马译本’关系辨析”,《世界宗教研究》,2000,第1期,第109—116页。
- ④ 孙遇春:“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不是圣经的宇宙观”,《世界宗教文化》,1995,第4期,第19—26页。
- ⑤ 李平晔依据路德对圣经的理解,阐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与新约圣经”,《世界宗教研究》,1984,第3期,第113—121页;杨慧林:“圣经诠释与宗教改革”,该文取神学诠释学的视角。《移动的边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第227—237页。
- ⑥ 吴秋林:“圣经寓言研究”,《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8,第1期。
- ⑦ 相关论述见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中的部分论文,上海:三联书店,1995。
- ⑧ 章智源:“圣经及其价值概说”,《合肥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第1期,第63—70页。

与古希腊犬儒学派、怀疑主义之间的对照,^②无论是对历史上耶稣的真实性的确认,还是通过综述当代部分神学家对传统基督论的挑战的历程以便为目前基督教陷入危机欢欣鼓舞,^③无论是对保罗的神学人类学的反思还是对早期基督教起源的探索,^④无论是从圣经关照西方人文精神之人观还是从诠释学神学解读“圣言”,^⑤都具有历史学的倾向,即依据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或者某种历史主题的发生学与文献学的史实做出论断。并且,这些学者们都努力企图从中归纳出一些普遍性的逻辑特征,归纳出相对于自身而言的绝对性的真理。这样的研究理路给予我们一种启示:只有从历史的以及逻辑的双重视角,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新约》的实质。

二、语言观的视角

传统的圣经研究只注重文本的结构、文本片断之间的关系,然而,圣经语言离开其产生与接受的处境便没有任何意义。经文

- ① 王神荫:“《死海古卷》与库兰社团”,《世界宗教研究》,1980,第2期,第123-134页;M.库勃拉诺夫:“库姆兰之谜”,《世界宗教资料》,1980,第2期,第35-41页。
- ② 谢文郁:“‘Q福音’研究:古老的新学科”,《世界宗教文化》,1997,第10期,第30-36页。该文作者的另一篇名为《Q福音之谜:挖掘真理的源泉》,见于刘小枫主编:《基督教文化评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10辑,第332-342页。
- ③ 胡玉堂:“历史上的耶稣”,《世界宗教研究》,1981,第1期,第84-100页;M.库勃拉诺夫:“对‘基督’的考证”,《世界宗教资料》,1980,第4期,第27-34页;颜昌友:“向传统的‘基督论’挑战”,《世界宗教资料》,1982,第1期,第6-9页。
- ④ 游斌:“πνεῦμα:保罗的神学人类学及其神学话语”,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4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陈恒:“文化的十字路口:犹太主义还是希腊主义?”《国外社会科学》,2002,第3期。
- ⑤ 许志伟:“位格与人:从圣经关照西方人文精神之人观”,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第8辑;杨慧林:“解读‘圣言’”,《移动的边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第149-171页。

只有在联系到具体的生活处境和受众时才有生命,存在于文本的修辞功能、言说者、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关系中。杨克勤在介绍西方学者关于修辞鉴别学的研究成果后如此总结说:修辞学关注言与思的关系,“修辞研究试图透过考察语言结构藉以发挥其功能的具体处境,来研究和观察听众的回应。”“一段修辞单元的处境并不只是‘生活的立场’,它还是言说者(作者)和受众(读者)双方对生活、经验和传统所发出的‘意识形态’教导与文化箴训。”“因此,理解修辞中的道也就是理解神学,即上帝在修辞进行的过程中进行工作的方式,新约修辞鉴别的研究对象不只是人的活动,它基本上也关注上帝在历史进程中的作为。”^①他还在希腊罗马的修辞学背景中讨论过奥古斯丁把西塞罗的修辞学基督化的历程。^②作者较为详细的研究成果体现在《古修辞学——希罗文化与圣经诠释》^③中,它讨论《新约圣经》的修辞学和古希腊罗马修辞学的历史和理论,从而理解新约圣经文本如何与古代希腊罗马以及旧约犹太文化互为施受,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经典诠释。作者指出:新约修辞和希罗的论证性修辞相比有其独特性,它“并不是一种对真理的呈现,而是劝说性的叙事宣告;它所宣告的事件激起了人们的信望爱。新约修辞的独特性在于它讲述基督的福音,这种讲述的目的是为了造就和改变个人、团体和社会”。^④作者还说,保罗的修辞建立在规劝和对价值的依循而不是分析性或表现性的逻辑说服的基础上。保罗思想的基本倾向源于犹太拉比传统,这种修辞传统运用技巧把希伯来人的宗教文献整理成论说性

① 杨克勤:“新约修辞鉴别学初探”,《燕京神学志》,2001,第1期,第88、91-92页。

② 杨克勤:“西塞罗与奥古斯丁的修辞学”,刘小枫主编:《基督教文化评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9辑,第140页。

③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3。

④ 杨克勤:“使徒保罗的修辞鉴别学:多文化的研究”,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第6辑,第54页。

质的语段。因此,对保罗修辞的多文化研究,修正和扩充了传统的希罗修辞理论,可以从中归纳出基督教圣经修辞的特征。

通过分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22 如何利用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不同的文化视域,杨克勤着手探讨“跨文化修辞诠释学”的原则。他假定,上帝与人的关系具有普世性,但上帝向人的启示受到处境、文化的限制。由于“本色神学尝试透过一个文化的层面说出神的同在和慈爱,所以,超越文化诠释是想透过多种甚至混杂模糊的处境来表达神普世的明确的真理”。^①他吸收伯克(K. Burke)的新修辞学理论,强调诠释者在释经中寻求彼此认同的重要性。在此意义上,跨文化修辞学看重群体的造就与更新。

如果说上述新约修辞的特征来自于和希罗修辞、希伯来修辞的比较,那么,梁工的圣经叙事研究在介绍了西方文论中“讲述”与“显示”这对范畴的历史后,就将其直接运用于观察归纳圣经本身。作为作者塑造人物的手段,圣经叙事中的“讲述”,“以全知的视点介入情节,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谈论人物,其间贯注着对人物是非善恶的评价。”^②它包括“叙事者的直接讲述、借上帝之言的讲述、其他人物的间接讲述(皆为对人物性格的讲述),以及对人物情绪、知情状态和主观意图的讲述”,^③对人物外貌和服饰的讲述。与此对照,“显示不以直接判断的方式说明对象,而运用间接描述的手段委婉地展示对象,使读者从直观描述中感悟出对象的种种特点。”^④它促使读者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空间。圣经叙事中的显示以对照性的对话为主体,同时也通过人物的行为,很少出现对环境即视觉景观的描述,这同上帝运用话语创造世界相关。遗憾

① 杨克勤:《跨文化修辞诠释学初探》,香港:建道神学院,1995,第60页。

② 梁工:“圣经叙事中的讲述和显示”,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化学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2辑,第196页。

③ 同上,第200页。

④ 同上,第202页。

的是,文章主要依据《旧约》圣经文本。事实上,除了福音书、《使徒行传》外,《新约》书信基本上没有“讲述”与“显示”的特征。梁工还写过关于以色列的社会正义观(民主制、犹太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方面的文章。^①

三、基督论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基督教教会恢复崇拜活动,学术界也开始了对历史上耶稣的重新探索,结果形成肯定耶稣实存与否定耶稣实存的两种观点。虽然没有像同时代的美学大讨论那样最终诞生几大学派,但是,这两种基督论实质上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基督教研究,即便一些学者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他们至少认为基督教的确是一个历史事实,对于人类文化、文明做出过独特的贡献。

耶稣实存的肯定论:从历史学角度肯定耶稣的存在

1981年,刚改名的《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发表了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63岁的胡玉堂先生的长文《历史上的耶稣》。^②编者说:“关于耶稣其人其事的历史性问题,是国内外基督教历史学者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作者在本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只能代表一种见解,有些看法尚需进行深入讨论和科学论证。”从文章内容和编者说明可知,他们对于耶稣的认识,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而非神学的角度。这种角度和基督教哲学思想的角度一起,后来

① 梁工:“试论圣经的民主观念”,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梁工:“简论圣经的犹太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第8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② 胡玉堂:“历史上的耶稣”,《世界宗教研究》,1981,第1期,第84-100页。

一直主宰着大陆学界对于基督教研究的基本走势,成为各所大学开设基督教方向的研究课程的重要依据。其问题显而易见:忽视了对圣经文本的深入研究。当然,在20多年前大陆的历史背景下,能够把基督教信仰的对象耶稣纳入历史理解的范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作者列举犹太史家约瑟福斯(又译“约瑟夫”)的《犹太古事记》^①、苏埃托尼亚斯的《诸恺撒事迹》等都提到耶稣基督,推论说:“各种不同的传说、记载,都归附到耶稣身上,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耶稣其人的说明。如果耶稣仅是某一时期、某一教会虚构、捏造的形象,这个虚构的耶稣,怎么能得到不同时期、不同教会流派的人数日益增多的广大基督徒信以为真?”^②虽然作者引用恩格斯的“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③的观点,从而以对原始基督教的研究代替了对耶稣本身的研究,但他大胆批评“全盘否定宗教经典和神话传说的历史性,是对古代历史研究的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关于基督教起源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也应该从《新约》中进行探索”。^④

作者接着引用福音书的材料,发现有两个耶稣形象:“第一耶稣”认为“天国是虚无、抽象的彼岸世界;宣扬‘爱敌人’,宣扬忍耐得救,屈辱有福;主张对现存统治势力妥协、顺从,对压迫者、剥削者卑躬屈膝”。“第二耶稣”“认为天国就是能够在现世出现的现实王国;主张通过斗争,通过暴力,促使天国实现;主张推翻反动的统治秩序,建立新秩序;主张反抗罗马统治势力和犹太教会上层,建立‘大卫王国’”。^⑤作者猜测地解释说:前者源于基督教教会在2世纪罗马帝国的处境,基本上是保罗派教会塑造出来的“第一耶

① 直到近1/4世纪过去之后的2004年,才有《约瑟夫著作精选》(王志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大陆问世,可见学术推进之缓慢艰辛。

② 胡玉堂:“历史上的耶稣”,《世界宗教研究》,1981,第1期,第87页。

③ 转引自同上,第91页。

④ 同上,第86页。

⑤ 同上,第90页。

稣”的形象；后者源于犹太战争以前以及犹太战争当时的历史传统。^①“第二耶稣”的这种传统，从耶稣和公元1世纪犹太教的其他教派，尤其是和埃赛尼(或“爱色尼”)派、狂热派(即“奋锐党”)、施洗约翰的关系可以看出来。早期基督教的传播、发展，同耶稣在传教活动中坚持一神主义^②和信徒平等精神分不开。

从神哲学角度思考耶稣的实存问题

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陆汉语学界虽然还是没有从神学方面推进对圣经文本的理解诠释，但却开始从神哲学角度思考耶稣的实存问题。其中，李秋零教授的“耶稣是如何成为神的？——基督教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教义的一种文化学诠释”^③便是一例。文章结合早期基督教面临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多神论与人的神化(把国家和皇帝当作神来崇拜)的历史背景，首先承认耶稣是历史人物，再解释耶稣被神化的过程。作者认为：福音书是口传的文字记录，其中内含夸张的成分。原始基督教正是在这种夸张中把耶稣神化，否则“不足以表达信徒们对这位创始人、领袖和导师的崇敬……，不足以扩大自己的信仰的影响(一为心理学的解释，一为文化传播学的解释——引者注)；而将耶稣神化，又与犹太教—基督教的一神论信仰相矛盾”。^④于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原始基督教形成三位一体的教义。

作者认为：神化耶稣的过程开始于福音书。在《马可福音》中，

① 于可在“初论原始基督教的演变及其必然性”中把耶稣的这两种形象扩充为原始基督教的两重性，见《世界宗教研究》，1986，第2期。

② 这种对犹太教做“一神主义”的理解，明显没有意识到基督教同基督事件的关联，而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理论来信仰，仿佛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种种主义一般。

③ 李秋零：“耶稣是如何成为神的？”《世界宗教文化》，1997，第11期，第22-27页。

④ 同上，第23页。

耶稣的世俗身份为拿撒勒人；它肯定了耶稣与上帝的特殊关系，但没有确定耶稣为神。同样，《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虽然把耶稣的家谱追溯到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人类的始祖亚当，但也没有把耶稣当作神。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犹太教的一神论传统限制了这样做。受犹太哲学家斐洛的逻各斯学说影响，《约翰福音》最终把耶稣提升到神的位置，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和解由此成为可能。据此，作者断言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的教义直接取材于《约翰福音》。不过，这种断言忽略了福音书的事实，因为至少《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经文等地方，也常常是神学家们用来证实三位一体教义的依据。当然，能够从《新约》本身的经文中分析耶稣的神化过程，和80年代学者们更多从其他著作文献考察历史上的耶稣的理路，已经是一个实质性的飞跃。

该文的逻辑性从下文叙述可见一斑：“《约翰福音》把耶稣描绘为神人一体，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耶稣身上所体现的神与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①由此进入对早期基督教各种异端的分析。

从基督教神学思想角度思考耶稣的实存问题

汉语学界的基督教研究如果欠缺了基督教神学的视角，那么，其缺陷乃是致命的。依据《新约》比较全面讨论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构成许志伟先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第七章的内容。它大致从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主、是上帝本身来言说他的神性，又从耶稣为童贞女所生、他在生理、心理上的成长经历谈论他的人性，再从教会持守的圣经传统略述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作者对救赎论与基督论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批评过分从救赎论角度去建立基督的身份，会“把基督约化为一

^① 李秋零：“耶稣是如何成为神的？”《世界宗教文化》，1997，第11期，第25页。

个事件。宣扬基督变为宣扬一个有救赎内容的基督事件(Christ-event),而不是一位救赎的位格上帝”。^①作者以基督复活事件为试金石,批评布尔特曼把“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割裂、将福音理解为基督徒的宣讲的神学观,赞同潘能伯格从历史的终结着手研究人类历史整体、将其与救赎历史相关起来理解的历史观。该章遗憾之处在于论述的各部分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关联,如逻各斯与基督的关系,原本可以归入基督的神性部分来探索,而作者只是把它当作探讨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过渡段落。

耶稣实存的否定论

胡玉堂先生的文章发表两年后,有学者根据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观点立论,写成《耶稣——传说中的虚构人物》^②。因为,当时异教以及哲学界的著作不屑提到耶稣及门徒所施行的神迹。根据约瑟福斯宣称以色列等待的救世主为韦斯巴芗而不相信耶稣是救世主,作者断言他的《古代犹太史》中提到耶稣的段落为后来基督徒添加的赝品。这里,一位历史学家宣称什么与相信什么,显然有别。何况,问题在于,历史著作中没有记载的人物就可以说他不存在吗?从论文的上下文可知,其结论主要是因为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上是否有耶稣基督其人本身就是问题。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是,学者之所以是学者,是不能只根据他人即便是革命导师的观点得出学术的结论,尤其是在针对基督教的起源这种复杂的宗教现象的时候。

该文还指出,由于《新约》的作者和写作年代无从确定,而且从所谓耶稣的政治主张发现它们彼此对立,所以,《新约》不能作

① 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78页。

② 颜昌友:《耶稣——传说中的虚构人物》,《世界宗教研究》,1983,第2期,第123页。

为耶稣存在的根据。其实,我们只需要问,一个人说话矛盾就能说他不存在吗?1949年前后,汉语学界的不少学者如朱光潜先生等,不但其著作在思想上有矛盾,而且甚至出现了自我否定的言词,难道我们可以推论说朱先生不存在吗?何况,福音书是由四位作者根据自己的神学理解与神圣体验来完成的,它们都是对耶稣行为与话语的诠释,我们无法断言究竟哪些是耶稣本人讲述的话,“我们所拥有的耶稣之言,都只是译文”^①,有的地方在表面上有矛盾乃是很自然的现象。至于说学者们无论从教会资料与非基督教的资料都没有发现关于耶稣的统一形象,更不能成为反驳耶稣是否存在依据。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的对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对马克思的形象也有不同看法,但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不存在。事实上,恩格斯的如下观点是本文把耶稣当作传说中的虚构人物的根本原因:“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众生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②

这种否定耶稣实存的观点,实际上受到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欧洲关于传统基督论即基督的神人二性的争论的影响。^③需要指出的是:颜昌友编译的“向传统的‘基督论’挑战”的文章混淆了西方学者批评的教会的耶稣形象与圣经本身中的耶稣形象。

四、跨文化视角

置身汉语学界的传统,学者们容易产生对圣经与汉语经典的

① 转引自杨慧林:“从‘悖谬’开始的‘理解’”,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3辑,第349页。

②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9页。

③ 颜昌友:“向传统的‘基督论’挑战”,《世界宗教资料》,1982,第1期,第6-9页。

比较研究。不过,目前的这种比较研究主要还停留在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等几个大的方面,限于希伯来、希腊、基督教、汉语思想的典籍与传统四大视域。

汉语思想与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论之比较

房志荣先生提出,为了同圣经的上帝比较,必须承认儒家思想的天有位格。在论及圣经的上帝时,作者着重谈到上帝作为父与爱对历史的介入、他对人的慈悲与公义、他彼此相互差别又相互关联的位格特性。因此,人要爱上帝与爱人,这构成约翰神学的一个特征。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由创造主而成为救赎主。因为,作者在先把儒家思想的天等同于上帝,天人合一之道即爱人爱天之道,因耶稣的亲身而得以实现。作者最终把“人人可为尧舜”理解为“人人可为基督”。^①不过,在儒家思想里,尧舜毕竟是人而非神,不同于作为神人二性之统一的基督。这种比较,在儒家思想与圣经之间因着强调相关性而忽视了其根本的差别。其缺陷因下面的论文得到弥补,通过考察天在儒家《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中的含义,总结出它有四种意义:相对于地的自然、物质之天(天空),作为宇宙最高真理的伦理之天(天理),掌管宇宙、具有位格之天(天神),支配人的命运之天(天命)。^②

基督教与两希传统中的道观(基督论)之比较

汉语学者讨论《约翰福音》的“道论”时,大多数都从犹太文化(《旧约》)中的道观、希腊文化中的道观、中国文化(哲学思想)中

① 房志荣:“儒家思想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之比较”,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第520页。

② 任炎林:“儒家的天道思想与保罗在《以弗所书》中之上帝教义的比较”,刘小枫主编:《基督教文化评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第1辑,第165页。

的道观三个方面入手,最后检讨其独特性。《旧约》的道是上帝的话(*dabar*),即上帝创造的话与启示的话,类似于智慧文献中的智慧。在斯多葛哲学中,道指内在于宇宙的神而不是具有超越性的、作为创造者的上帝。斐洛(约公元前20—公元后50)同时赋予道以超越性的含义,认为道是宇宙存在的意义。因此,《约翰福音》的读者尽管因思想背景的不同而对道有不同的理解,但约翰把上帝创造的话与启示的话归结为基督,并进入历史,体现在他在世的生活里,成为肉身。“中国哲学思想或者以天为有人格的上帝,而认为道是根本的原则,或者认为道比上帝更为根本,道是一种非人格的实在。”^①

在约翰神学里,“道”是其核心的神学范畴。谢扶雅比较了将《约翰福音》引言中的 *logos* 翻译为“道”与“圣言”(拉丁文的 *verbum*)。由于在汉语思想里“道”已经包括有“言”的意思,同时为了赋予“道”以神圣含义,他提出用“圣道”译之,望能调和基督新教、基督公教两大教派的译名。^②这是从“道”的译名看《约翰福音》引言与汉语思想的相关性。两者在所指意义上的差别还延伸到希腊思想。^③《约翰福音》引言的道与汉语思想中的道的不同,表现在作为上帝成为肉身、有位格的真人与作为宇宙的无位格的原理、法则的不同,在上帝主动自上而下的神学启示与不可言的存在实体(道家)、人的道德思想的产物(儒家)的不同,在创造和救赎相关的道与只有创造无救赎的道(道家)的不同。

道成肉身作为约翰神学的独特贡献,还是理解世界的一种路径。在神人关系上,它表明上帝与人同在;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

① 骆振芳:“关于约翰福音‘道论’的探讨”,《金陵神学文选 1952-1992》,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2,第153页。

② 谢扶雅:“圣言与道的和合”,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第409-412页。

③ 见张子元:“约翰福音引言的‘道’与中国之‘道’”,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第420-421页。

上,它表明耶稣的拯救是对人的整体的拯救;在属灵与属世的关系上,它表明上帝通过耶稣与世界的关联,人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循上帝的旨意;在今生与永世的关系上,它表明人因信与基督联属而在今生开始永生。^①这是从道与肉身的相关性方面理解世界中的各种关系,但不能忽视从两者的差别性而来的理解路径,即从耶稣的神性方面重新审视世界中的种种关系,以保持基督教本有的对世界的先知性批判精神。^②此外,刘光耀讨论了知识论的圣言:从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出发,探讨人类知识的可能前提、基督教知识论的前结构,^③作者进而批评了道家、儒家在知识论上的设问为存在者、道的无言导致以人言代替道的危险,释家为“不存在”。

汉语思想与基督教中的人观之比较

上帝的救赎既然以人为对象,那么,将中国哲学中的人、人性同《新约》之言说做比较,乃是圣经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从“实践层面”与“形上实体层面”区分“我”,温伟耀认为他力主义宗教否定的是前者而肯定作为生命活动主体的后者。《新约》这种强调“他力”的信仰,并不否定“自我”的存在及其活动。作者认为,和上帝相比,肉体生命的认知能力及成事能力都具有有限性,依靠这种有限性以企及无限的领域,构成了人性的自我疏离。^④

① 蒋佩芬:“道成了肉身”,《金陵神学文选 1952-1992》,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2,第13-21页。

② 参见汪维藩:“道在这里成为肉身”,《金陵神学文选 1952-1992》,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2,第144页。

③ 刘光耀:“基督教:知识论的逻各斯”,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99页。

④ 温伟耀:“新约人性论”,何光沪主编:《基督教文化评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3辑。

希伯来与西方人文精神的人观之比较

除了把基督教的人观同中国哲学相比较外,许志伟先生还将其与西方人文精神的人观做比较。目前,西方人文精神的人观,主要表现为人在生物层面的受精卵的独特性、在心理层面的心智性(包括人的理性、意识、自我意识、对他人的意识、语言交流能力)、在社会层面的关系性,三者处于一种能动的交互关系之中。^①圣经的人观,首先取决于对“上帝形象”的理解。作者认为,它首先指“上帝造人并与人建立关系,其次是人回应上帝,凭借信心、通过恩典与上帝相交”。^②人作为上帝的形象,需要在人神关系、人人关系、人物关系上回应上帝的创造。耶稣正是在这些关系上回应上帝,显示出他的完美形象。“基督教的人学最终是上帝中心论,而不是人中心论”。^③据此理解人类及位格人,其起点在于上帝通过受精卵创造一个新人成为他的形象,并与之建立关系。

基督教与希腊传统中的伦理观之比较

张宪从古希腊经典以及福音书思考伦理问题,把希腊人的德性伦理总结为柏拉图追求在理念中的绝对价值、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道、斯多葛学派的“无动于衷”原则等,认为“希腊人所谓至善的理想是在和谐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理性操练、中庸之道和自我克制”。^④这种注重此世幸福与自我完善的伦理,强调“宗教灵性与身体不可分割的精神,关怀邻人之同情悲悯的爱的伦理”。^⑤其道德

① 许志伟:“位格与人:从圣经观照西方人文精神之人观”,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第8辑,第179-189页。

② 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34页。

③ 同上,第138页。

④ 张宪:“德性和福音”,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3辑,第256页。

⑤ 同上,第257页。

上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使每一个人在他的一切行为中成为圣洁的人。……其伦理要求显然着重生活意念的纯洁,对于一切道德诫命的专心不二的遵从。”^①其原因在于把上帝的观念置于一切道德目的之中。它内含的上帝观为:“一方面具有正面强调那提升人的价值的神爱的终极意义,另一方面又含有一种叫人永远谦卑,因罪得宽赦,不断趋向与神合一的完美境界。”^②要言之,福音伦理属于神学伦理,德性伦理属于人学伦理。这也是中国知识人普遍接受希腊传统而忽视犹太传统的原因。因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伦理,缺乏人神关系上的纵向超越维度,主要是一种人学伦理。

五、个别论题

基督教起源、爱色尼派与《死海古卷》

初期基督教的诞生与爱色尼派(又译“艾赛尼派”或“埃赛尼派”)即所谓的库兰(又译“库姆兰”)社团关系最为密切相关。王神荫的论文“《死海古卷》与库兰社团”^③在思想上可以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少有的从内部研究早期基督教如何形成的代表作。它以《古卷》中的《会规手册》为据,论及其中的会员等级、管理结构、共同生活,经过仔细探讨发现“财产公有”只限于完全入会、级别在“圣洁”、“特别圣洁”的正式会员之间。文章的结论为:犹太教爱色尼派的库兰社团和初期基督教同为犹太教的分支。

① 张宪:“德性和福音”,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3辑,第266-267页。

② 同上,第270页。

③ 王神荫:“《死海古卷》与库兰社团”,《世界宗教研究》,1980,第2辑,第123-134页。

对观福音

笔者的“橄榄山对话的历史逻辑及其救赎意识”^①认为：橄榄山对话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理解福音书的历史逻辑的微观路径。该文在阐明了历史逻辑的内涵后，从历史逻辑的问题域的四个方面切入橄榄山对话：末世的信仰观、天国的正义观、隐微的时间观和隐喻的言说观，并具体分析了它们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彼此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及其内含的历史救赎意识。笔者依据约翰神学的文献，讨论了它在语言、时间、正义、信仰几方面的特征。^②至于保罗神学的基督论，有翁绍军的“保罗基督论及其神性内容”。^③另外，杨克勤还讨论了保罗神学的末世观与工作伦理。^④在女性神学方面，有《圣经中的女性》^⑤一书出版。研究性的反思作品，见王屹的“重读圣经：一种女性主义的诠释”。^⑥

六、评 估

从世俗科学的角度研究基督教在汉语学界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由于学者们普遍欠缺神学及作为其基础的圣经语言的专业训练，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圣经领域获得多少果效。它表现

-
- ① 张贤勇主编：《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19期，香港：道风书社，2003。
 - ② 查常平：“约翰神学的语言观与时间观”，《宗教学研究》第4期，成都：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05；查常平：“约翰神学的正义论与基督论”，《实现综合艺术评论》第4期，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2005。
 - ③ 翁绍军：“保罗基督论及其神性内容”，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第2辑，第120页。
 - ④ 杨克勤：“保罗的末世神学”，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第3辑；杨克勤：“论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末世及工作观”，《燕京神学志》，2000，第1期，第70-76页。
 - ⑤ 弘文主编：《圣经中的女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 ⑥ 杨慧林、余达心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第5辑，第59-84页。

为研究视角单一:汉语学界的圣经研究从圣经的语言、时间观念、社会正义方面切入者较少,比较突出的是基督论的、跨文化的比较视角;即使是基督论的视角,也主要是从历史学、神哲学而不是神学传统中的角度,仅关涉历史上的耶稣问题;从新约研究所涉及的对象看,对观福音、路加神学、普通书信、《启示录》基本上无人问津。另外,宏观研究缺少深度、微观研究也有待深入。面对今天汉语学界的基督教研究,我们更需要强调神学角度而不只是其他世俗科学的角度。

作者查常平(1966—),男,中国人民大学2001级博士,现供职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圣经神学、逻辑历史学、艺术评论研究。已出版专著《历史与逻辑——作为逻辑历史学的宗教哲学》、《人文学的文化逻辑——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等。